

《施氏族谱序》考辨

邵启凤,王为刚

(泰州博物馆,江苏泰州 225306)

摘要:通过对现存施氏族谱、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的研读,发现陈广德所作《施氏族谱序》存在诸多疑问,如施耐庵籍贯苏州、施氏家族是否是望族、陈广德的进士等级及作序时间等等,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陈广德所作序言当为施氏后人的托名作品,目的是为了提提高《施氏族谱》的可信度。

关键词:籍贯;族谱;陈广德;序言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4-0007-04

清朝咸丰初年,施垞、施振远等人修撰施氏族谱,重建施氏宗祠。咸丰四年(1854年)夏天陈广德途经白驹,应施垞父子所请,为祠堂题写匾额“新祠式焕”,并为《施氏族谱》作序。^[1]长期以来,陈广德所作序文一直被作为研究施耐庵的重要资料。然而,在研读《施氏族谱序》之后,笔者发现所谓的陈广德序文存在诸多疑点,其应为后人的托名之作,兹做简单分析,抛砖引玉,以期廓清《施氏族谱序》之真伪。

一、陈序中关于施耐庵籍贯的问题

在《施氏族谱序》问世前,施耐庵的籍贯有杭州说、淮安说、兴化说,从未有苏州说,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罔顾族谱中的相关记载,仅凭施垞父子的一家之言,陈广德贸然提出施耐庵洪武初年自苏州迁兴化的说法,令人费解。

1. 与明清文献施耐庵籍贯杭州说相矛盾

关于施耐庵的籍贯,清乾隆以前的文献记载均为杭州,代表人物有高儒、胡应麟、郎瑛、顾公燮等人。

高儒曾明确指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2]高儒(?-1553年)字子醇,号百川,河北涿州人,高儒家族地位显赫,藏书丰富,叔祖高凤曾担任司礼监太监,分管经厂,父亲高荣曾担任尚宝司丞,高儒曾担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武定侯郭勋多有交往,有条件接

触宫廷、藩府、卫所及民间藏书,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3]

郎瑛认为:“《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4]郎瑛(1487-1566年)字仁宝,号藻泉,自号“草桥子”,人称“草桥先生”,浙江杭州仁和人,是明代文学家和藏书家。

胡应麟记载:“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5]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明代学者、诗人和藏书家,胡应麟对书籍的收藏近于痴狂,“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6]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顾公燮:“施耐庵,钱塘人,与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归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7]顾公燮(清乾隆年间人)字丹午,号澹湖,又号担瓠,苏州人,“好搜罗稗野,以著述自娱”。^{[7]3}

钱塘、武林均为杭州之别称,文献作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和收藏家,他们生活的时代较陈广德少则早几十年,多则几百年,可以说在清乾隆以前施耐庵是杭州人为学界共识。

2. 和族谱中所载施耐庵、施让墓志铭的记载相矛盾

现存较早的施氏家谱为民国七年(1918年)释满家抄本《施氏家簿谱》和民国十六年(1927

年)刻本《施氏族谱》,前者抄自乾隆四十二年施封《施氏长门谱》,后者为咸丰四年施垞续修,陈广德作序,即本文所讨论序文,二谱均附载《施耐庵墓志》和《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文字略有差异。

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记载:“公讳子安,字耐庵,……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先生家淮安……去岁其后述元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8]702}施耐庵为官在钱塘,归里到淮安,在淮安著书,并死于淮安,归葬兴化大营,其中里指淮安还是兴化语焉不详,但墓志全文未提及施耐庵的出生地,更未提及苏州。

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记载:“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11]确指施让的鼻祖居于兴化,后来迁往海陵白驹。无论鼻祖指九世祖还是始祖,至少施让的父辈、祖辈就居住在兴化。该墓志铭记载了施让及其妻顾氏、陈氏的生卒年月,施让生于洪武癸丑年(1373年),据此可以确定其父生于元代无疑,其祖则更早,也就是说施让祖、父早在元代就居于兴化。

修谱者将两篇墓志纳入族谱中,说明其认可墓志内容,既然施让的父、祖早在元代就居于兴化,何来洪武初由苏州迁兴化一说?修谱者收录了墓志却又视而不见,甚至故意误导作序者,令人生疑。

3. 和后世出土文物的记载相矛盾

公开资料中与兴化施氏家族相关的出土文物共五件,分别是施文昱为其父所立地券、施廷佐墓志铭、施奉桥地券、施□桥地券、施子安残碑,其中1978年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提及施氏家族故居。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为明嘉靖甲申年(1524年)立,铭文记载:“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苏,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9]虽然这段记载有个别文字由于漫漶不清存在争议,但是“故居兴化”“白驹”等字清晰可辨。根据施廷佐墓志铭记载,在施彦端出生之后,因元末农民战争爆发,施氏家族“播流苏”,说明其另有原籍;“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可知施氏故居是兴化,也就是说施元德、施彦端父子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前生活居住的地方是兴化,洪武初年施氏家族是重返故园,而不是迁到兴化。

至于怀故居兴化却去了白驹,有两种可能:一

是施彦端家族原为民籍,后因故变籍为灶民;一是施彦端家族仍保留原有民籍,因战争对其故居破坏大,故寓居在白驹场,即如嘉靖四十四年施□桥“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五都人氏寓泰州三十五都白驹场运盐河西居住”。

4. 关于施耐庵籍贯姑苏的几个说法

施耐庵籍贯姑苏的说法最早见于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其次是施垞的《建祠记述》,民国李恭简所撰的《施耐庵传》,以及曹晋杰的《回忆材料》。

由于咸丰《兴化县志》并未收入施耐庵的相关资料,说明陈广德纂志时并不了解施耐庵和兴化的关系。陈广德序文中称“耐庵之精于文”,“其第二世处士君,杨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和“铭所云‘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表明陈广德看过《施耐庵墓志》和《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令人疑惑的是施让墓志铭已经明确记载“鼻祖世居扬之兴化”,陈广德仅凭“吾兴氏族,苏迁为多”和“今其裔孙振远所述者也”,就认为施耐庵家族明初由苏州迁来令人难以置信。

施垞的《建祠记述》:“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后徙居白驹场。”虽然其成文在陈广德作序的次年,实际上施垞父子是苏州说的始作俑者,陈广德序声明有关内容是施振远讲述的,这里施垞利用所谓的陈广德序,和大家玩了一个互证的游戏。

李恭简主持修撰的《兴化县志》收录了《施耐庵墓志》《施耐庵传》《施隐公墓》等资料,这些资料均位于《兴化县志》各卷的补遗部分,为李恭简撰修时补入,时间在李恭简任伪兴化县长期间(1941年到1943年)。李恭简所撰《施耐庵传》以袁吉人的《耐庵小史》为蓝本演绎而成,无论是支伟成、任志远辑《吴王张士诚载记》,还是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引袁吉人《耐庵小史》均未提及施耐庵祖籍姑苏,所载张士诚造访施耐庵均发生在张士诚起义之初,其中《吴王张士诚载记》载《耐庵小史》确指施耐庵为白驹场人。《施耐庵传》是李恭简在《耐庵小史》的基础上演绎而成,“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8]624}为了迎合施耐庵祖籍姑苏一说,将张士诚造访施耐庵的时间从初缮甲兵时改为据吴称王后,会面地点由白驹改为苏州。《施耐庵传》记载施耐庵是白驹人,祖籍姑苏,住在苏州,避在淮安,

哪有从未到过白驹、祖籍姑苏的白驹人?

施廷佐籍贯姑苏说见于曹晋杰1982年2月的《回忆材料》中关于《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的相关记载,曹文记载“公讳翔,字廷佐,祖籍姑苏。”(大丰县施耐庵纪念馆筹委会编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调查报告》(校正本)。关于“祖籍姑苏”等字释读,仅曹晋杰一家之言,同时期赤布、刘冬及稍后的喻衡等人对施廷佐墓志铭的释读,均未认可“祖籍姑苏”,仅以“□”替代。根据施廷佐墓志铭记载,兴化为其高祖施元德、曾祖施彦端的出生地和居住地,白驹是其祖父施以谦、父亲施景□的出生地和居住地,仅施元德、施彦端避难苏州十几年,根据古代籍贯指曾祖的出生地和长期居住地,施廷佐的籍贯当为兴化无疑,曹晋杰所谓的施廷佐“祖籍姑苏”说根本不成立。

二、关于明清时期施氏家族是否是望族

陈广德所撰《施氏族谱序》记载:“施氏,望族也。”这个所谓的望族值得怀疑,纵观施氏家谱,除去施耐庵那个存在争议的元代进士,可以说不见一个当官的,只有一个乡饮大宾,以及几个庠生、廪膳生和国学生,非官宦之家无疑。

施耐庵墓志记载,施耐庵弃官归里后,隐居淮安,直至1370年去世,数十年后才归葬原籍。施让墓志铭和地券(后世出土)记载其镌刻时间为1453年,施让去世(1421年)32年才入土为安,说明直至此时施氏家族还不是富贵人家。

施封《施氏长门谱序》记载:“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坠。”以抄本传世的施氏家谱,经历代增补,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十三世施圣言“被回禄而因销亡”,一把火就没了,直到乾隆四十二年施封“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才重辑而成《施氏长门谱》。整个施氏家族就一份手抄家谱,未能刊刻,可见“族本寒微”并非自谦之词。

施垞在《建祠记述》对施氏家族的经济状况说得更详细,在乾隆戊申年(1788年),施文灿等人将施莫邦的住宅改建祠堂,初具规模,但因为施文灿等人去世,“未成厥功”,又因为缺少维护资金,几十年后就破败不堪;道光丙申年(1836年),施垞和侄子施金等人重建祠堂,想向全族议捐购地,“族中力不从心者,固不过问,即可以饷粥者,亦置若罔闻。”^[13]可见族人多家境一般,富贵之家甚少,直至咸丰壬子年(1852年),施垞自己首先

倡捐,历时四年时间才勉强修好。像修建祠堂这种合族大事,尚且如此费事,施氏家族的经济基础可想而知了。

《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记载:“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所谓的“本望族也”,指兴化施氏家族原本是望族,到施让时已家道中落,甚至不能排除到白驹后沦为灶民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从施以谦到施垞的十几代人中,施氏家族既无官宦,也无富豪,根本就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三、陈广德序末落款存疑

陈广德,字懋亭,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恩科三甲第二十七名,^[10]后官户部主事。在陈广德中进士时,其父已去世,陈广德是大孝子,就想接母亲去北京,然而在去北京的途中,陈广德的母亲受不了舟车劳顿之苦,中途又返回了兴化。由于无法尽孝,为官没几年,陈广德就辞官返回兴化,主持兴化文正书院,“讲席衡文,一以先正为程。”^{[8]619}著作有《蕉根集》《周易纂义》《兴化对》等。兴化四牌楼“行为士表”匾就是表彰陈广德主讲文正书院时以身作则,为士子表率。

陈广德序文落款为户部主事,是正六品,对应的散官官阶为承德郎,加一级对应的散官官阶为奉直大夫,两者正好对应。清代进士除去一甲三人外,必须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成绩优良者留馆,授以编修、检讨之职,其余分发各部为给事中、御史、主事,或出为州县官,陈广德任户部主事当在中进士三年后,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后。陈广德为官时间短,官职低,没什么政绩,因为其孝顺寡母故加一级。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彼此之间的等级差异明显。陈广德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这一点别人不清楚,陈广德自己清楚。历届科举考试结果政府都向社会大众广而告之,自我抬高科举等级的行为有损个人清誉,像陈广德这样一个为士子表率的人绝不可能为之。据此可以判断所谓的《施氏族谱序》不是陈广德所作。

之所以将赐同进士出身的陈广德误为赐进士出身,笔者认为当是受咸丰《兴化县志》误导。据

县志记载,县志分纂者包括“赐进士出身户部主事陈广德”。^[16]民国兴化县志中虽然有陈广德传记,但没有提及陈广德的进士等级及名次,冒名作序者被咸丰兴化县志中的相关记载所误导。

四、陈广德作序时间存疑

根据陈广德所做的《施氏族谱序》记载,其题匾作序的时间是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暑后二日,这一天为公历 1854 年 8 月 25 日,农历闰七月初二。据施垞的《建祠记述》记载,咸丰乙卯年二月(1855 年 3 月)祠堂才“经营粗就”,此时距陈广德作《施氏族谱序》长达七月之久,可以推知在陈广德作序时施氏祠堂尚未建成,甚至尚未动工,工地杂乱,何以纳凉?祠堂尚未完工又怎么会将族谱置于其中?施垞声称陈广德纳凉于施氏宗祠有画蛇添足之嫌。

陈广德的作序及题匾时间之所以选在咸丰四年,是因为此时兴化县志已编纂完成,在此时发现施氏家谱,正好可以解释咸丰兴化县志中无关于施耐庵记载的疑问,如果陈广德作序在此前,其编纂兴化县志时势必会收入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其时陈广德人在兴化,托名陈广德作序不易被揭穿。

冒名者选择陈广德作为冒名对象,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从明代晚期开始,几乎整个清代,对《水浒传》的态度都是严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朝多次颁发严禁水浒的诏令。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百六十三:“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

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12]457}

《钦定学政全书》:“乾隆十九年议准:《水浒传》一书,应飭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一体严禁。”^[13]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咸丰元年辛亥七月乙巳:……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督飭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12]468}

《水浒传》作为“蛊惑愚民”“诱人以恶”的禁书,被历代政府烧书毁版,陈广德作为一个退休官员、传统文人,咸丰元年的《圣训》不会不知道吧,怎么敢公开赞誉“耐庵之精于文”?敢公开给施氏族谱作序?

五、结语

施氏后人之所以托名陈广德作序,是因为陈广德是兴化名流,文正书院院长,咸丰兴化县志的分纂者之一,目的是想借陈广德名望来增加家谱的可信度。只是冒名者没想到的是,陈广德如果真的看过施氏族谱,读过施耐庵墓志、施让墓志铭,作为兴化人,不可能对施耐庵祖籍兴化的记载视而不见,仅凭施垞的一面之词,就认为施耐庵是洪武初年从苏州迁来的。所谓的陈广德序言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施垞修谱时的伪作。正因为是伪作,难免顾此失彼,漏洞百出,最令人遗憾的是这篇伪作序言又被人作为证明施耐庵不是兴化人的证据,这是始作俑者万万没想到的。

参考文献:

- [1] 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J].文艺报,1952(21):41-42.
- [2] 高儒.百川书志古今书刻:卷 6[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82.
- [3] 罗旭舟.高儒生平家世与百川书志[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3):96-104.
- [4] 郎瑛.七修类稿:卷 23[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4.
- [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41·庄岳委谈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8:571.
- [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4·经籍会通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55.
- [7] 顾公燮,甘兰经.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M]//薛正兴.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69.
- [8] 李恭简.续修兴化县志:艺文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702.
- [9] 喻蘅.施耐庵四世孙廷佐墓志铭校读札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1):105-109.
- [10]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78.
- [11] 梁国楙.重修兴化县志:纂志衔名一[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7.
- [12]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13] 霍有明.钦定学政全书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2.